

· 客家研究 ·

“客家”身份的建构

——殖民体系下的香港新界与台湾六堆*

陈丽华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

摘要:“客家”族群在香港新界和台湾六堆有不同的历史形成背景。两地在 19 世纪末期以后分别受到不同殖民政府的统治;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客家”身份建构呈现出差异;由于两地历史经验的不同,“客家”身份形成的时间与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藉由比较新界与六堆两地客家族群与认同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差异与联系,有助于更进一步思考近代殖民经验对于族群身份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 新界;六堆;殖民地;客家;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1)01-0001-11

前言

香港新界,是指依《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给英国的地区,范围为深圳河以南、九龙以北,包括离岛的地区;在这个范围内,明代以来便有讲广府话为主的大族定居,他们占据了大片的土地。清代以后陆续移来的客家人,居住范围则从靠近深圳的沙头角,下至西贡、坑口,延伸到九龙、荃湾,19 世纪晚期时,也到达了离岛长洲。^[1]根据香港政府 1911 年的统计,整个新界地区客家人的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2]位于台湾南部的“六堆”,则是包括屏东、高雄县境内数个乡镇的狭长地域。六堆即前、后、左、右、中、先锋堆的总称,源于清代武装民团组织的称呼,这一地区的客家人曾多次协助清政府平叛,位于“前堆”的竹田乡西势村内的忠义亭,见证了清政府表彰“六堆”报效尚义的勋荣。^[3]时至今日,这里也是台湾第二大客家聚居区,仅次于 18 世纪以后开始发展的北部桃、竹、苗地区,六堆的客家人入垦历史则更早于北部。

客家人大量移居到这两个地区,可以追溯到清初。东南沿海出现的重大变化,包括了:顺治 18 年(1661)以来的迁海令逐渐废止,闽粤沿海逐渐复界;康熙 23 年(1684)收台湾入版图,开海禁,发布开垦令,鼓励移民开垦。大量客家移民因而涌入东江、西江流域以及台湾,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地域社会格局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外来的“客”与当地人的摩擦和冲突,文献中对于“客”的记载也日渐增多。^[4]

其中,韩江中上游与其它移民一起涌入台湾的客家方言群体,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事变中,举起“义民”的旗号,抵抗来自漳、泉以及潮州讲福老话的群体,受到官方嘉奖,此即后来的“六堆”。而在广东省南部东江下游地域社会内,移民而来的客家人,遭遇的是讲广府话的“土人”,他们则被广府群体称为“客家”。这样的他我分界并没有因时消弭,反而,到了咸同年间,日益激烈的土客冲突,加速了不同语言群

体间的分化,客家人的自我意识也日益高涨。^[5]在珠江口的香港新界境内,客家人也自行组成“约”的乡村联盟,与本地大族的相势力抗衡。^[6]

可以看出,清后期逐渐形成的“客”,是与“土”相对的概念,主要表示迁入时期的早晚和土地所有权的差异,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主要由此衍生而来。这一现象,也被 19 世纪以来渐次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官员及商人等所注意,不过,他们并非是毫无偏差的客观记录者,当时正是西方人种学发展起来的时候,该学说相信人类可以根据头颅、肤色、语言、血统等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种族。^[7]这样一种背景,怎样影响了他们、以及后来的殖民政府对于客家人的理解?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客家族群意识在南中国开始逐渐发酵之时,这两个地区的“客家人”却处在不同的殖民政权统治之下,其身份塑造,又经历了怎样不一样的历史过程?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试图了解在香港新界和台湾六堆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客家”这一分类观念从何而来,在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建设、移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及文化创造下怎样演变,又如何影响了地方社会不同的历史建构过程。

一、殖民政府的人群分类

在英国和日本统治者分别进入新界与台湾以前,这两个区域都处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1898 年,英国政府租借新界,当年 8 月,香港辅政司兼华民政府司洛克(J. H. Stewart Lockhart)奉命勘查新界地区。在他 10 月份致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到新界地区的居民“由三类中国人组成,即:本地、客家和疍家。”与此时间相近的是,在三年前的 1895 年,日本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台湾殖民地后,随军队脚步建立的各地方行政机构不时向总督汇报地方状况,当年 12 月,南部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台南民政支部凤山出張所,便在报告中专辟一部分报告“有关客家之事”。^[8]

为何英、日殖民政府一开始便断定殖民地有“客家人”

* 收稿日期:2010-12-02

作者简介:陈丽华(1978-),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博士,研究方向为台湾地方社会史、客家族群史、殖民地比较研究等。

存在?从他们的调查举动也可以看出,殖民地官员对于新附属地的人民的了解也是相当有限的,那么,这一分类知识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便留意到客家人和其它人语言上的差异。

瑞典新教教派的巴色会(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不少人曾到客家地区传教,注意到了客家人与本地人方言的不同。^[9]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影响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与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土客械斗,使得他们描述的客家群体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从而造成了影响。牧师韩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于1854年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使用了音译的“hakka”一词,指称天王洪秀全出身的嘉应州方言群体(Kia-jing-chau dialect),也说明了该词来源于广东省本地人(Punti people)对其它移民的称呼(kheh-kia)。^[10]此后在英文文献中,hakka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来指代讲客家话的人群。

十余年后,同样是巴色会传教士的德国人欧礼德(E. J. Eitel),曾在宝安县讲客家话的小区传教,更对客家人进行了专门研究。他曾撰文这样勾勒广东省的语言和人种,

当前广东省的人口与英格兰在诺曼人入侵之后的人口一样混杂。当时的英格兰有英国、撒克逊人、丹麦人与诺曼人等,人种问题同样重要。……同样的事情也在广东显现,苗子(Miau tze)被赶到广东西北部的山区,第一批入侵者,现在将自己称为本地人(Puntis),不知何时迁来,宣称拥有该省的所有权,并成功击退另外两个不同种族(races)的其它入侵者,现在被称为客家(Hak-ka)和福佬(Hoklo)(或者潮州人)。这两个种族在本质上与本地人以及彼此间在语言、特性以及举止上均不同,如同撒克逊人、丹麦人与诺曼人一样。福佬人(或称潮州人,意为从广东省东北的潮州地区迁来的)类似丹麦人,主要栖居海边及大的河岸地区,而没有向广东省内部扩散;而客家人,如同诺曼人一样,在全国扩散。^[11]

可以看出,欧礼德是用一套英国人熟悉的人种分类观念,系统地整理了中国的人群分类,将广东省的人群区分,论述成了种族的分别。这些词汇在中文中所具有制度、法律、移民、方言歧视等含义,已经不明显了,而成为同质化的、具有生物与文化意涵的种族符号。

欧礼德和当时的很多传教士一样,不止对传教有兴趣,也对殖民地的经营及文化感兴趣。这篇文章全称为《客家人种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于1867-1868年间分期连载在《中日记录及访问》上。这份刊物乃1867年创办于香港,以探讨殖民地政策和中华文化为主,当时英国已经在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另外还有南洋地区——包括马来亚以及1824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新加坡、檳城和马六甲三个港口组成)。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如何认识与管理他们成为西方人要进行统治时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在该刊第1期上,即有人询问有没有客家话的书或者词汇表出版,他们主要分布在哪里等,显示出对于这一人群的兴趣。^[12]欧礼德的长文,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响应。

欧礼德被当时香港的西方人视为中国文化的权威,随后更身体力行,加入殖民政府官员的行列。1870年代以后,他便长期在香港政府任职(任视学官等),其观念也影响到英国殖民政府对于香港中国人的认识。1895年,他出版最为著名的《欧洲在中国——从开埠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一书,延续了上述的分类,将分布在香港岛和九龙的中国人分成Puntis, Hakkas和Hoklos三个种族(race),这对后来新界居民的分类有直接的影响。^[13]

1898年调查新界的香港辅政司骆克,便承袭并改造了他的分类观念。骆克是苏格兰爵士,长期在中国担任殖民地官员,通晓汉语并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是有名的中国通。^[14]他亦将这一地区的汉人根据语言划分为三个种族(race)，“本地”(Puntis)、“客家”(Hakkas)与“疍家”(Tarkas,即水上人),并且仔细地统计和记录各村落人口组成。^[15]客家人和本地人均成为殖民官员眼中的原居民(aboriginal inhabitants),变成一样的殖民地人民,这一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新界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下文会再提及。

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港,19世纪下半叶这样的分类也跟随西方传教士、官员等进入台湾。^[16]如海关官员兼商人的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及东南亚生活了近30年,在英国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他在1898年出版的《Pioneering in Formosa》(中译名《老台湾》)一书中,回忆了1863-1870年在台湾的生活,曾经这样描述居住在岛上的汉人:

西部沿岸和从北到南的整个的冲积平原,都由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移民们居住着,他们说的是欧洲人所谓厦门话的一些变体。除掉广东北部的潮州人之外,中国其它各省的人完全听不懂这种话。这些移民叫作“闽南人”(作者注:原文为Hok-lo“福佬”)。闽南人的妇女们,除掉奴隶之外,都缠着小脚,中国人美其名曰“金莲”。

在较低山脉之间的乡村,在南角,以及在野人地区之边界的各处地方,我们都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distinct race)叫做“客家人”(Hak-kas)或如“闽南人”所称呼他们的“客人”(Kheh-ling)。这些人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所说的是中国官话的一种。^[17]

上述“闽南人”是50年代翻译者所使用的词汇,作者原来写作“福佬人”,翻译名词的变化显示出到了50年代对于福佬人的定义已经缩小到福建南部人(闽南人)。不管如何,作者认识到客家人讲的方言不同,广东的潮州人则与福建的福佬人接近。他也认识到台湾社会内的称呼是“客人”,这也是一种他称。可以看出必麒麟对台湾社会内不同人群及其语言是极其了解的,这也和他后来的经历有关。1870年代以后他一直担任海峡殖民地的华语翻译官和华人护民官,对于华人地域及“秘密会社”分类背后的方言差别极为熟悉,这可能也影响了他对于之前接触的台湾汉人的看法。写这本书的时候,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却被英国媒体视为中国问题专家,他也极其关注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要提醒英国政府注意日本殖民台湾之后的远东形势变局。^[18]

著名的加拿大传教士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 年底来到台湾, 当时必麒麟已经离开。不过他在台传教近 30 年, 1895 年出版了 *From far From osa* 一书, 采取同样的分类法, 其书曾广为引用, 也有日人将其书翻译改写成日文。^[19]

从日本殖民者接收之初的记录及出版品来看, 当时已经有部分日人官员及知识分子认为台湾社会内有“客家人”, 其观念很明显是受到西方人士论述的影响。^[20] 日本贵族院议员竹越与三郎 1905 年出版的《台湾统治志》, 是当时最权威的殖民地统治情况论述, 其中这样描述台湾的人种:

1904 年初春的调查, 总共有人口 3, 137, 000 其中中国人占了大部分。他们分成两大类: 福老和客家。这一区分在中国最初是历史、社会原因导致的分别, 但逐渐形塑成人种学上的分别。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附近地区移民, 通常称为福老, 或者如一些著者所称的闽族, 人口约 240 万人; 其二广东地区移民的子孙客家, 一些人称之为粤族, 人口超过 40 万, 全台的平原地区均为这二族占据。^[21]

这段论述, 可谓是殖民地官员将台湾社会分类观念糅合了西方种族观念而成。在清代, 台湾社会内并没有“客家”一称, 而是通常以原籍分为“闽”和“粤”两大类, 后者常被称为“客人”。竹越与三郎在原来的籍贯分类基础上, 植入本质论上的差异, “粤族”遂与西方殖民者带有种族含义的“客家”混同起来。

更为重要的, 是日本殖民政府在殖民地台湾, 建立了比日本本国更早的户口调查与登记制度, 这也是竹越与三郎能够在书中提出两大种族人口数据的原因。1903 年以后, 殖民政府发布一系列有关户口调查的法令, 便涉及到种族区分问题, 台湾的汉人种族被划分为闽族、粤族两大类。如此一来, 在清王朝之下“客籍”在移民地权力争夺中面临的问题便被消解了, 成为同质化的人群划分单位, 并通过户口登记固定下来。^①

与英国殖民者强调种族在语言、血统上的差别不同, 日本殖民者更强调的是文化、社会上的差异, 这一点也被用来合法化台湾殖民地的特殊统治方针。曾任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持地六三郎认为, 土人所属的支那人种, 与日本民族都属于支那法系的民族, 二者的关系可以模拟加拿大的英人和法人。但因二者社会状态的不同, 土地制度、亲族制度、风俗习惯等均不同, 故基于殖民统治理念与不同法制的需要, 应了解旧惯, 制定特殊法律。^[22]

除了殖民政府引入西方观念带来的人群分类变化, 在英、日殖民者接收殖民地的过程中, 客家群体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在殖民地秩序建立及以后的社会变化中, 也有不同的际遇及影响。在近代殖民秩序的建立过程中, 是以土地登记为首务。在香港新界及台湾六堆, 这个过程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

二、土地改革与社会结构变化

在新界, 迁移较早的本地大族控制着大部分土地, 而客家人则一般是清初移民而来, 从本地大族手中租佃土地进行耕种。殖民政府统治新界之初, 对于土地权问题颇费思量。他们首先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考察, 认为理论系统上很好, 但却无法实施, 导致土地问题很困难。为了按照英国的法律和土地制度进行管理, 首要问题是登记业主 (owners), 以便准备地税册 (Crown Rent Roll); 而拥有土地的证明文件则包括契约、租册及税单等。1899 年 7 月 12 日, 总督卜力 (Sir Henry Arthur Blake) 下令在各个乡村中张贴关于土地登记公告的中文版本, 公告规定需要登记业主、契约及土地的详细情况, 由土地所有人拿地契到土地局进行登记, 以便厘清土地权利归属。^[23] 从 1900 年至 1903 年, 大规模的土地调查展开。先在新界东北的大埔成立了土地局分支, 10 月份在屏山设另外一支。不过登记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时任殖民地秘书和总登记官的骆克, 在 1900 年关于新界的报告中说, 当地的居民 (inhabitants) 害怕土地和地租被夺走, 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令土地登记进行缓慢。^[24] 1899 年 8 月 2 日、4 日, 大埔和屏山的长老士绅即接到了总督的训示, 警告他们不要和政府对抗, 并要求他们在土地登记问题上合作。^[25]

随后相继颁布的三个有关新界田土的法令, 对于土地关系的改变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1899 年新界田土法庭法案》(The New Territories Land Court Ordinance, 1899)。《1900 年新界田土法庭法案》规定 1898 年起 99 年期限内, 新界所有土地都是政府所有, 改变了新界土地的拥有形态, 使当地人的永业权变成承租权。《1900 年官地收回条例》(The Crown Lands Resumption Ordinance, 1900) 则规定, 政府有权收回新界土地作为公共用途。^[26] 1904 年, 政府宣布新界的土地都是官地, 任何对新界土地权利的要求都必须由《1900 年新界田土法庭法案》成立的法庭进行讼裁。^[27] 第二年, 正式给土地的业权人发出集体官批, 规定未经政府许可, 不可随便改变土地用途。

以上政策, 使得新界的土地产权明晰化了, 其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本地大族原本宣称对新界大片土地拥有的控制权旁落。在清代, 大族在政府登记缴纳赋税的土地往往是少量的, 实际却通过宗族对入住权、土地开垦权利的控制, 把持土地的田底权, 后来到的客籍移民可以从他们手里获得“永佃权”, 向其交纳地租。^[28] 也就是说, 英国人的到来, 使得大族依靠传统掌握的土地权丧失了。

一个足以说明这样的法律变化造成影响例子是在 1901 年有关青衣岛地权的争论。根据土地法庭成员 Gompertz 报告, 1900 年政府宣布收回离岛的土地所有权, 新界本地一支大族锦田邓氏称整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家族的, 当地耕种的人均需向其交租。在 Gompertz 的要求下, 邓氏必须拿出地契为证, 邓氏最后拿出一张 1788 年向清廷交税的单据, 其中一项为青衣土地 36 2 亩。尽管邓氏声称其祖先为该地修筑堤坝, 建筑鱼塘, 但是因为缺少证明文件, 因此,

① 关于清代闽、客法律地位上的差异, 可以参见李文良关于粤籍学者的争夺。李文良, 《学额、祖籍与地方社会——乾隆初年台湾粤籍生员增额录取案》, 《台湾文献》, 第 59 卷, 第 3 期, 1-38 页。

Gompertz宣布邓氏自称对整个岛屿有权是不允许的,只允许他们收40石租。^[29]至于原本在土地上耕种的居民,Gompertz认为应从永佃户(perpetual lessees)转移为传统租户(customary lessees),他们向邓氏租佃的362亩土地,需要继续向其纳租,扣除这部分外,其余土地应向英国政府缴纳地租,因为现在土地权是属于英王的,任何对该岛土地权利的宣称,除却这362亩继续开垦的部分,都是对“官地”(Crown land)的侵占。

尽管实际上,作为佃户的客家人,在经济上只是改变了交税的对象,但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却从大族的阴影下走了出来。特别是原本作为大族佃户的客家人,由此便成为英政府官地的承租人,他们原本需要向原拥有田底权的地主缴纳的租金,在法律上被取消了。他们的法律地位便和以往透过地租控制他们的大族变得平等,在政治上成为可以和本地大族相抗衡的力量。以邓氏宗族势力庞大的龙跃头为例,英国的土地政策使他们完全丧失了田底权,经济实力大为衰落。^[30]在20世纪初,逐渐退到龙跃头的东北地区,而将土地卖给由较近的宝安县迁移来的客家移民。这批移民主要是信仰基督教的,并逐渐吸引了巴色会在梅县、五华、宝安默林等地的客家人来此,组成了名为“崇谦堂”的村落,20年代以降人口渐多,也成为新界变为殖民地之后发展起来的客家村落的代表。^[31]

崇谦堂村的例子说明客家人在新界地区地位与影响力的升降。其创建者之一的彭乐三,1875年生于广东省宝安县龙华,1896年毕业于巴色会所办的李朗神道大学校,后来在广东五华、紫金、新界大埔、沙头角等地传教。1904年,他在新界粉岭崇谦村辟教会新址,次年迁住此地。^{[32](P12-21)}1913-1934年间,因建学校、教堂、基督教坟场、道路桥梁等事务,他曾多次与大埔理民府等进行交涉,向政府要求批给公有地,进行建设。由于政府对教育与道路等乡村建设也是持支持的态度,故大多能获得应允,且进行补助。^{[33](P11-37)}此后,一个客家基督徒的小区,就迅速在原本由本地大族控制的龙跃头兴旺起来。

在台湾,20世纪初期也同样经历了日本政府对台湾土地登记与地权改变的过程,不过地方社会的态度却极为合作。早在1898年9月“匪患”尚未肃清之时,台湾总督府即成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1900年开始办理全岛的土地清查与登记。前后历时七年,用费5235800余圆,调查面积777850甲(甲为台湾土地单位,1甲约11亩),显示出日本殖民政府对掌握地籍与确定地权的决心颇巨。^{[34](P354-355)}在掌握地籍后,殖民政府更进行了土地改革,取消了大租权,确立近代的土地关系。同时,政府也对水利系统进行了登记,试图确立权力关系明确、全岛统一的管理方法,这样的发展不仅为殖民统治建立基础,更为发展商品化生产创造条件。

从清代开始,六堆地区的土地权利关系便形成以台南等地亚闽籍地主掌握大租权、当地粤人为小租户的格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土地地主为六堆之外的闽人。不过,粤人作为实际掌握土地的人,他们不少人渐次设立堂会等组织,将土地再转手交给派下佃耕,形成一田多主的格局。^[35]1902年至1903年间,当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办理这一地区的土地登记时,基于这一地区惯习不同,大租户多为不在地地主,便由小租户进行申报。^[36]土地调查也显示出六堆地区有大量的“公业”、“共有地”存在,殖民政府将各种公业土地,登记在“管理人”人名下,从而制造出一个固定的、具有法律地位的管理人角色。

土地调查的完成,也使得日本殖民政府能够将这一地区的“荒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的使用,也成为与本岛土绅建立关系的筹码。总督府早在1896年便制定了有关国有土地开垦的规定,若申请并成功开垦后,只要付出每千坪(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五十钱的代价,即可取得业主权。^[37]1902年政府又对适合蔗作土地的开发予以奖励,规定垦成之后不征地价即交付业主权。^{[38](P377)}由此,台湾总督府便可以低廉价格、优惠条件,将部分土地开发权授予与殖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人士,成为其遂行土地拉拢地方士绅的最好政治手段。日治初期六堆地区最显赫的大绅士、任台南县参事的李廷光,便曾用这种方式获得大片土地开垦权。1903年3月,李廷光即以开垦成甘蔗园为由,无偿取得阿猴厅下南岸等庄官有原野约220甲,1906年全部开垦完成,并照糖业奖励规则无偿获得业主权,^[39]在当时下淡水地区的开垦者中首屈一指。

不过,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土地关系进行了改革,取消了清代以来的大租权。在此之前的1903年底,政府先用立法确认大租权利,同时成立大租调查委员会;^①然后从1905年至1912年,政府陆续以公债买收各地大租权,从而消灭了大租权,确定了小租户为业主。^{[34](P354-355)}这一改革消除了日人眼中一田多主的“弊政”,确立绝对排它的近代土地所有权。由此,在六堆部分地区拥有大租权的不在地闽籍地主阶层,以及本地曾买收大租权的富有人士对土地的权力便被取消了,地方人士缴纳赋税的对象直接变成国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人士负担的减轻,但由于小租户的土地权利受到殖民政府的法律保护,他们得以继续向佃户征收佃租,从而保障在这一土地权利的变革过程中,继续维持在地方社会的地位。^[40]这一变革对于六堆地区而言,实际上保护并强化作为小租户的地方绅会等的力量。^②

可以看出,无论在土地政策,还是地方组织上,政府都是一律对待,都没有特别的族群考虑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殖民政策其实是模糊了客家的身份,而不是凸显了客家的身

① 六堆地区所在的蕃薯寮厅、阿猴厅是在1904年初进行的,数据显示查阅率极高,未阅者寥寥无几,显然切身利益攸关,民众都极为重视。《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第5回事业报告》,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明治38年(1905),111-2页。

② 不过一些本地持有大租权的组织便受到影响,这其中便包括忠义亭。在日治初期,在西势最有势力的家庭,曾氏的曾裕振祀典九岭户,还要向忠义亭缴纳大租谷。数量为2石,约相当于1甲下则田1年的最低租金。《裕振祀典壬寅岁(1902)接立九岭户存簿》,1902-1923。此份数据由曾令毅博士提供,谨致谢意。

份。不过在社会的层面上，“客家人”实际上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更大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的变动，也与此有关。

三、客家人政治势力的变动

早在 1895 年，欧德礼著的《Europe in China》中便提到，“从英国人登陆之初及和中国人的战争中，本地人（Puntis）通常都是外国人的敌人，而客家人（Hakkas）则是朋友、伙食和粮食的供应者、苦力输送者。”^[41]这一故事在英国占领新界之时再次重演。

1898 年，英国政府租借新界，与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于当年 7 月 1 日生效，不过直到次年 4 月，英军才正式占领香港，在此之前则试图熟悉这片新领土的状况。在 1898 年香港布政司洛克对新界进行调查之时，便遭到了新界本地大族邓氏的抗拒，洛克带领英军闯入了邓氏聚居的锦田吉庆围。本地大族掌握着新安县土地的地权，他们深恐英国占据后，土地权将会丧失。^[42]1899 年 4 月，随着英军正式进入新界，以锦田邓氏为首的本地大族，联合锦田、八乡、屏山、厦村、青山等地乡民，抵制欲在大埔墟竖旗的英军，随后在林村、上村等地与英军交战，很快被英军击败。^[43]4 月 16 日接收新界的同时，就在大埔、沙田和九龙城设置了警察局，4 月 22 日又在屏山设立了一个，此后，陆续在全岛范围内建立起来。^[44]其主要监视对象就是本地的大族。

在新界与殖民者相对抗的是“本地人”，而在台湾则是“客家”群体。根据日人的记载，“抵抗我军者仅广东移住之粤族而已。”^[45]^(P468)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人，向来有打着“义民”旗号，协助清朝官府镇压叛乱的传统，在日本接收台湾之际，他们尚依靠乡兵练勇，抗击登陆的日军。前文提到“有关客家之事”的调查，而进行的，调查中提到：

早先于刘永福败走时，彼等顽迷不醒，高唱起义召集堆民，据于火烧庄抗拒我军，其于 11 月 26 日之战一败涂地后魂散胆破，且闻马关条约之内容，始自迷梦初醒，不及旬日管辖内完全肃清，无复一名叛逆者。^[45]^(P466)

日人已对六堆与日军相抗的具体细节作了详细记载，主要为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台湾学者已经将其翻译并更名为《攻台战纪》与《台湾抗日运动史》等，此不赘述。相较之下，闽南人地区的接收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也使得日治初期殖民者对于客家人（尤其是六堆）颇为忌惮。

英国在新界的统治秩序确立后，地方社会的士绅父老，仍然在乡村社会发挥作用。他们不时有非正式的聚会，共同商讨区内事务。这些基层的组织，是日后新界乡议局属下的各区乡事委员会的来源。^[46]新界乡议局正式成立是在 1926 年，是新界地方人士在港英政府下最为重要的政治机构，传统上属于不同权力体系的本地人和客家人，都参与到这一机构中来，作为新移民的彭乐三，更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1934 年为贺彭乐三六十寿辰，新界乡议局同人所作贺词，其中提到，

1923 年，田地起屋补价之例起，各乡人士，认为业权已失，奔走呼号，希图挽救，先生当仁不让，出任维持，1925 年，遂组成乡议公局，致力数年，始达豁免目的。

虽此事有同仁勤赞，而得力于先生者最多。自是之后，同人等以先生毅力过人，实心任事，迭次推认局长，历年枵腹从公，办理公共事业，调解梓里纠纷，裨益地方，良非浅鲜。^[47]

从文中可以看出，新界乡议局的成立，直接导源于新界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政府进行抗争的举动。“田地起屋补价之例”是指 1923 年，政府公布《民田建屋补价条例》，规定新界农地如欲转为屋地，政府除保留批准权外，还饬令补缴地价。这一举动将大大影响居民的收益，立即遭到群体反对。以彭乐三为首的六人代表小组，是年 11 月便上递呈文给北约理民府；1924 年 8 月，以荃湾的杨国瑞、粉岭的李仲庄及元朗的邓伟棠等为首，集合各区乡绅共 102 人，在大埔文武庙开会，决定成立“九龙租界维护民产委员会”，同年 11 月，决定以隐藏其政治目的的“新界农工商研究总会”的名称注册，^[48]其后成功令政府收回成命，1926 年由总督敕令正式改为新界乡议局。

由新界乡议局出版的《新界中立报》，虽然时间迟至 70 年代，但收录了几份该组织成立之初的一些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里面是由不同人组成的，具有多个不同名号，但很显然，以彭乐三、李仲庄为首的士绅，已经成为整个组织的领袖。出任新界农工商研究总会会长、第一届乡议局局长的李仲庄，及副会长杨国瑞，也是客家人。而其成员则涵盖了新界陆地部分的客家和本地乡镇，锦田邓氏、上水廖氏、粉岭彭氏等新界本地大族也在其中。此后，彭乐三更先后担任第二、三、五、九届乡议局局长，在乡议局早期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49]

在乡议局人士递交英政府的呈文中，我们注意到他们是以同一种身份出现的，即将自己视为新界的“土人”、“民”以及“居民”，不管原本讲的是哪种语言；而在该地稟屋居住的新移民，也不论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均被称为“外人”。^[50]可见，他们代表的是整个“新界原居民”，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利益攸关的人，是与政府交涉时最有效力的身份符号，孰是“客家”孰是“本地”并不重要。定居不过 20 年左右的客家人，和已经超过数百年的本地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下，此时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但是，新界的客家人，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新界，如何崛起为一股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并能和本地历史悠久的大族平起平坐呢？这个趋势在乡议局之前，便已经在不同的地方权力网络中显露出端倪。如 1915 年成立的“合益公司”，是由南边围伍醒迟、屏山邓润山、十八乡戴炬成、八乡上村黎金泰等创办，他们开设了元朗新墟，与原本由锦田邓氏控制的旧墟相抗衡。支持新墟最力者，是十八乡、八乡的客家村落，本地人的厦村、屏山等也有参与。^[51]可见客家人在原本由大族控制的新界地方社会，已经上升成一股明确的政治力量。1937 年，北区理民府的政府公报，曾提到乡议局及合益公司的长老，是政府处理不少地方事务时最为得力的助手。^[52]

至于彭乐三政治实力的累积，也可以追溯到更早。在他编撰的崇谦堂村史中，也有对这段历史的记载。

自改革以来，内战频仍。影响所及，遂至各属扰攘，

风鹤频惊,劫掠时闻。目击时势,对于保身卫家,诚不能不未雨绸缪,先事预防之设备也。爰于1918年,联合粉岭安乐村、龙跃头各都里,组织联安堂,议定条例,备款向政府领取自卫枪枝。^{[53](P59)}

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他成功打入本地大族的权力网络并成为领导者,联安堂是个由地方精英组成的组织,从上述参与的村落也可以看出其周边本地大族的村落也都参与进来。同时,还需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取得枪枝,这可能也是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彭乐三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1920年代晚期,他还成立了成员范围更广阔的联和堂,是一个客家人的组织,帮助他们抵抗本地人的欺负。^[54]

人类学家 Nicole Constable 曾经对崇谦堂村进行过细致的研究,探究这些客家人为何能够在一个本地大族邓氏超过五百年历史的环境中定居下来,而之前的客家人往往以失败告终。她认为,这和这个小区的基督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客家认同的维系,也建立在其特别的宗教信仰之上。^[5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初一些新来户,也曾遭遇到本地大族的反对,如在英殖民政府刚进入新界前后,陈乐真牧师到龙跃头祠堂村买田赁屋,结果“受土人及工役之欺蒙扰害,事变环生,仅一年,折阅资本不少,乃返深水埗,续任传道职务。”^{[53](P6)} 而1928年,新界“各属扰攘”,相邻安乐村人封锁了崇谦堂人来往的道路,彭乐三等与之争讼良久。^{[53](P18)} 在这种环境之下,崇谦堂的客家人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以及港英政府的权威,打击政治对手。出现问题,牧师就会把问题直接拿到港英政府的理民府那里,而不是传统上请地方长老解决,也有想学客家话的牧师代他们撰写英文申诉书,港英政府的裁决往往有利于前者。特别是1931年,彭乐三成功申请到村北的官地,用作为教会的坟场,并使理民府发出命令,要求此处的非基督徒坟地全部迁走,这在当时的新界是史无前例的。^{[53](P26-32)}

相较之下,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台湾六堆地方士绅,固然在土地所有权确立的过程中,以小租户身分取得合法土地经济权利,但是,其政治地位,却比清政府时代大大下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六堆联盟的权力格局被彻底打破。在清代,他们与王朝的关系极为密切,曾是屡受官方嘉奖的“粤籍义民”,六堆也是官方倚重的地方武装势力;到了日治时期,警察成为地方行政的中枢,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完全归于殖民政府,六堆也被行政区划分割,联盟零碎化的结果,使得以往聚集地方势力的六堆象征,让位于殖民地下的国家体制的扩张。在这一背景下,与殖民政府的关系,便成为地方士绅地位的主要来源。殖民政府依靠地方行政、保甲体系职务的任命,荣誉性质的绅章颁发、参事任命等,选择并承认部分地方士绅的地位(尤其是有科举功名者)。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殖民者政府将明治维新以来建立的基础教育体系移来台湾,在城市和大的乡村设立给台湾地方人士就读的“公学校”(日本人就读的是“小学校”),令地方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1915年,在台传教超过40年的牧师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描述的,

那些与我商谈的弟兄们也承认,他们的孩子进入公学校就读,确实得到了很多好处,例如:学费全免;成效

良好,严格但不苛刻的教育;让学生们在通风良好的建筑中,学习对未来工作有帮助的学科,并有机会学得别处学不到的日语知识。最后这项好处受到很大的重视,因为这些机灵的信徒早已看出,任何品行端正、能力中等的年轻人,只要能够说流利的日语,或许就可以在全岛各地众多的政府部门当中,找到一份收入优渥的翻译或文书工作。^[56]

不只是他以及新教教徒们,很多台湾人都认识到公学校不只是传播近代科学的地方,也是教授日语,亦即殖民母国语言的地方,虽然1915年以前公学校入学率不及10%,入读者却能够透过进一步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具备日语沟通能力,成为殖民地下的地方精英。^[57]

六堆地区日治时期最显赫的地方士绅、曾任至总督府评议员的后堆内埔庄钟干郎,便是殖民地最早的公学校毕业生之一,约在1897-1898年间入学。他在回忆录中道:

(内埔警察分署)署长山内定一和凤山国语传习所内埔分所主任伊庭广吉二人常来我家。劝我入读该所,攻读日语。当时家父有意携带我们迁回广东原乡,惜种种原因未克成行,也就不得不让我入学,一年两回还有奖学金四元二角可领,后改为内埔公学校。^{[58](P10)}

钟干郎的祖父乾隆年间来台教书及营商,积累起资本,父辈则出了三位秀才,家庭地位日升,^[59]因此日人地方教育者也极力争取这一家族的支持。钟干郎随后进入当时殖民地的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就读,1905年毕业后被分派到一所糖业讲习所教书,之后通过日人学生的关系调回屏东农会任职。据他描述,“职位是判任官(委任),在当时的台湾人任此高位似以本人始,颇为满意。”在农会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又辞职经营米谷生意。在农会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也为他的事业发展帮助不少。1920年地方制度改革后,殖民政府在乡村社会大力拔擢受过殖民地教育的新一代士绅担任地方领袖,六堆地区地方领导阶层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也成为新晋派的代表,随后出任内埔庄庄长达十六年。^[60]

日治后期的殖民地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得客家人在社会地位上有了跃升的机会。六堆地区大量土地在这一时期开始转种经济作物香蕉,主要是出口导向,远销日本以及其它日本势力所及之地,地方总体的经济实力亦大为增强。钟干郎也是依靠这一背景,在地方社会地位逐渐达到巅峰。其回忆录载:

民国13年(1924),我曾看到高雄地区出产的香蕉甚有前途,乃在乡中奖励农民植蕉,以后并和高雄的柏尾具包、桥本安博、按井芳之助、韩哲乡等筹组高雄青果同业组合(现高雄青果运销合作社前身),成立后由高雄州内务部长任组合长,柏尾和我任副组长,叫做高雄青果同业组合,即现在高雄青果运销合作社的前身。高雄横滨航线开拓之后,高雄蕉的身价倍增,不出几年间输出日本竟达300万笼,有惊人的发展。高屏农民获益至巨。^{[58](P24)}

从文中可以看出,1924年高雄青果(指蔬菜水果)合作社筹组者,有几位日商,也有闽籍商人,是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营

销的大地主商人组织,其官方色彩亦十分浓厚,由日本殖民地官员——高雄州内务部长出任社长。

这一机构是日治后期高雄州下最为重要的经济实体,其影响力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也成为六堆农业社会地主精英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舞台。在殖民政府的介入下,之后其组织方式出现很大变化,即为了殖民母国日本消费市场的利益,透过支付补偿金方式排除了商人势力,以实现产销一元化。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六堆乡村的人士来说,是极佳的势力上升的机会,虽然合作社囊括了高屏地区不少实力雄厚的闽粤籍士绅,但客家人在其中的地位尤为显赫。除了日人社长外,副社长则一直由六堆地方领袖担任,后堆内埔庄长钟干郎便长期担任此职。除此之外,合作社内也有设置评、代议员,由各庄的检查所选出二名代议员,官派一名,从中再选出评议员。整体来说,来自六堆的新兴阶层也往往超过 1/3 远高于客家人在高雄州不足 1/5 的人口比率。^[61]

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时代的各项制度,打破了传统的闽粤藩篱,各籍人士都被纳入近代国家的建构之中,不过客家人依靠近代殖民政府下的经济格局安排和制度变化,提升了自身的地位。那么,传统的六堆军事联盟不再,作为义民象征的忠义亭义民庙也日益没落,在这一背景下,六堆地方人士如何维护其客家群体的认同呢?事实上,他们是采用了日治时期兴起的近代体育活动形式——网球比赛来表达此一认同。据后堆内埔公学校校长松崎仁三郎记载 1932 年 1 月,在竹田公学校举办的第三届六堆联谊网球大会情形,

六堆当中,除了佳冬庄、新埤庄以外全都出席,各庄全都对奋魁极为狂热。主办大会的各庄长、公所的职员、学校教师及有志者,而六堆出身者本州岛下的勿论,在台南州等地任职的也回乡参加,大约达到了三百名。^[62]

可见在日本殖民地时代,虽然政治上六堆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地方人士仍然认同“六堆”这一传统的地域联盟符号,并以自治的地方行政单位庄,以及普及教育机构公学校为依托,透过新的形势与组织,延续了地方社会整体的认同观念。到战后,这些符号便结合起来,成为六堆地方人士表达客家身份及对国民政府认同的方式。

四、政治移民与客家意识

从晚清开始,由于中国急剧变动的政治环境,以及西方人种学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导致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同步高涨,^[63]另一方面也成了占有主导地位的方言群表达对其他方言群歧视的方式。尤其突出的是广东省,1907 年,顺德人黄节编纂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即谓“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在当时引起了客家士子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邹鲁、温廷敬、钟独佛等为首的客家学者“正本清源”的研究热潮。^[64]

这种观念随着 20 世纪初近代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客家知识分子一种有意识的“客家认同”建构。陈春声的研究便展示了 1860 年以后汕头开埠对于族群意识形成的影响。20 世纪初,汕头不但成为韩江上游嘉应州的经济枢纽,也成

为该地域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五方杂处的城市生活使得认同与分类变得明显起来。^①随着该地开埠而导致的商业、移民人口变化,原乡潮、客方言群的族群建构,甚至也影响并导致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社会族群身份的重新建构。^[65]

20 世纪初,这一观念也随着新移民涌入香港。1921 年,一群旅居香港的客籍人士共同倡导成立了香港崇正总会。根据罗香林描述的会史,便直接与出版品歧视言论导致的反弹有关,

1920 年(民国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西人乌耳葛德(R. D. Wolcott)所编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于广东条下,谓“其山地多野蛮部落,如客家等是”。记述荒谬,客家人士,闻之大哗,群谋交涉更正,于是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有客属大同会之组织。广州方面,于翌年夏间,并派饶美棠、姚雨平、黄炼百诸先生来港,与香港客属人士廖新基、李瑞琴、黄茂林、赖际熙、何天池、吴穉畴、林圃香、黄锦英、江瑞英、张镜康、温葆六等联络。决定于 9 月 29 日,假座西环太白楼游乐场,开旅港客属代表大会,组织旅港客属团体,俾与国内各地客属大同会,互通声气,共策进行。^[66]

文中提到的诸多人名,实际上都是活跃在香港工商业的客家人士,其后翌年成立的崇正总会,其创办目的便是要大力支持工商业,经营慈善;同时考证客家渊源,究其亲睦。^[67]这些旅港客商往往与殖民政府关系颇好,他们一方面是与大陆保持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在港岛的从事商业活动,此外也与南洋等地保持来往。^[68]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殖民地社会环境下,在港岛等地区新兴的商人群体的活动,在他们财富积累、日益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的背景下,毗邻广东地区客家自觉意识的高涨,客家人政治势力的上升,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崇正总会正式成立后,学者赖际熙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并连任 13 年。^[69]他是广东增城县岳潭埔人,清末光绪 29 年(1903 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丞参部行走。^[70]辛亥革命之后,一批内地学者到港,在香港继续宣扬和维持中国传统文化,他就是其中之一。殖民地高等学府香港大学原无中文部门,他遂被聘创办并主持港大的汉文教育多年,1937 年去世。作为一位负有盛名的学者,其加入为崇正总会在文化与系谱上的“正本清源”,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观新界客家村落自身,与前述客家建构的关联则要微弱得多。崇谦堂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他的移民是在大陆的“客家意识”建构之时才移居香港的,彭乐三也直接参与了建立世界客属联盟的活动,在 1921 年 10 月选出的崇正总会第一届值理名单中,便可见他的名字,并一直任至 1946 年。^[71]不过,考其《香港新界龙跃头崇谦堂村志》,仅有两处提到“客族”、“客人”的说法,“溯客族之迁居于龙跃头,实始于前清光绪 24 年(1897),即距今三十有七年前也。”“此客人迁居本村之缘起及经过之情形也。”^[72]这里的与其说是“客家认同”的表现,不如说是地缘概念与原乡意识的

① 陈春声,《韩江流域的社会空间与族群观念》(未刊稿)。

表达。

近 30年后,号称客家研究鼻祖的罗香林,又将这一客家意识的建构推向了高潮。他在政治上忠诚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1949年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移居香港,和崇正总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51年起也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成为继赖际熙之后,考证客家源流、宣扬客家意识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版的《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大幅刊载了罗香林所著《客家源流考》,成为该会在以后连结台湾、南洋及海外客家的主要经典。

罗香林的学说被介绍到台湾,是日治末期的事。当时为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使地方人士了解南支南洋的情况而翻译成日文,这一日文版也被日人带到海南岛等地。在战后50年代上半叶,来自广东兴宁的客籍人士萧耀章(毕业于台大,工作于土地银行),出于“先从客家同乡着手推广民族教育”的想法,打算翻印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罗香林认为台人读日译本更易了解,故提供有元刚的日译本,“我们把这两册书送到台北万华某印刷厂影印了两千部,除了寄给罗教授两百部外,其余由张翠堂先生负责向客家同乡推广。”^[72]张翠堂为新竹人,此书可能在北部造成更大的影响。

到战后的50年代,台湾社会内有一个统一的客家人组织,这就是台北的客人会。根据北部苗栗客家人温送珍的回忆,

台湾光复初期,客家人在台北属于少数族群,大部分从事比较粗重的工作。最初,何礼谦召集一群客家人,大年初九天公生这天,在大稻埕陈进奎经营的茶工厂聚会,早上以全猪拜祭天公,中午席开十数桌,大家互拜新年,相互联谊,因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何礼谦即召集徐傍兴、陈重灏、林昌福、张昌广、宋霖康、张芳燮、周东郎、张心渊、黎传金、陈新壬、陈新春、潘德青、彭云鹏、何礼栋、曾坤灯、张木生、温送珍……等人筹组客人会。

……第1届客人会席开20桌。此后,每年正月召开一次,后来改名客家会。^{[73](P36-37)}

从名单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在台北活跃的南部六堆和北部桃竹苗商人等组成的团体,特别是六堆出身的医师徐傍兴,被温送珍称为客家会的“灵魂人物”,“因为徐傍兴热心会务,出钱出力,致有人以为徐医师为客家会的创会会长。”^{[73](P38)}这一组织和三十年前香港的崇正总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即城市环境下发展出来的工商业者及其它行业精英组成的联盟。当然,二者的社会背景是差异很大的,台湾的客家群体,是在日本殖民地下,才能在台北获得一席之地,战后从日治末期的经济禁锢下走出来,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均有了更大的抱负。在迁移来台的国民政府中,客家人也有很大势力,对本土的客家人也是一个刺激。

在南部高屏地区,战后也有不少来自广东省的军公教人员,特别是客家知识分子进入屏东地区的政府部门、军队、学校等文化机构任职,他们对在大陆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学说的流布,起了关键的作用。屏东县文献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正式运作至1960年,大陆回台的六堆客语知识分子钟桂兰担任了主持工作。^[74]进行实际工作的编纂组,钟桂兰为组长,组员为曾联兴(1953年来台的客家人^[75])、钟焮光,均为客家人。在1960年他退出文献委员会后,亦由大陆来台的客家人古福祥主持。在清代历史上,六堆地区所属的凤山县几次修志均是由闽南士绅主导,而战后的县志编修则主要由客家人主导,这在该地区可谓是破天荒的一次,以致志书中处处流露出对该地历史叙述的“客家中心主义”。罗香林的客家学说,便构成了贯穿该志始终的主要论调。^①

1951年1月,迁居粉岭的罗香林,也受洗成为基督教崇谦堂教友,1954年并成为该会董事。^[76]这一事迹成为崇谦堂村这一较晚近的客家移民村,保存客家认同时的文化资源之一。^② Constable的研究注意到,在60年代以来工业化与本地化冲击下的新界,崇谦堂却非常特别地保持着强烈的客家意识。她认为,崇谦堂的居民,利用家族故事、社会记忆和文件史料所融合而成的历史性故事,对客家历史不断地进行重新诠释,是其认同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的原因。^[54]1956年,香港中国学社出版了罗香林编著的《客家史料汇编》,收入了他历年收集的广东、香港、台湾等地40余姓族谱,也包括了香港新界的廖氏和台湾六堆的张氏族谱。^③透过这位客家研究鼻祖的努力,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与仍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便都纳入了其叙述框架,1949年以后的客家移民与清代以来汉人的客家移民传统,也由此被连接进了同一个客家民系的故事。

从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国民政府由于政治和外交上联络华侨的需要,与崇正总会等境外客家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一个更大范围的客家建构活动势头逐渐形成。正是在国民政府被挤出联合国的前后,世界客属总会成立,崇正总会举办了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台湾六堆也开始在徐傍兴资助下编写《六堆客家乡土志》。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客家人本来存在各自的组织,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过程,现在他们都被纳入了“客家”的历史脉络,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77]构造身份的潮流由此逐渐一发不可收拾,并日益汇入全球化与族群分类的潮流之中。

结语

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客家族群建构的历史,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密不可分。由于西方种族观念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客家”逐渐被塑造成为具有本质特

① 钟桂兰、古福祥纂修,《屏东县志》,卷2人民志,据1954-1971年修辑之《屏东县志稿》及排印本《屏东县志》整理合编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② 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客家学研究者郭思嘉的研究即涉及到这一问题,见 Nicky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③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 357页。1963年秋-1965年春,弗里德曼的学生裴达礼(Hugh D. R. Baker),也以上水廖氏宗族为对象进行人类学的研究。认为他们是被本地同化的客家人。Hugh D. R. Baker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pp. 38-39 London, Cass, 1968.

征的族群。然而,在香港新界与台湾六堆的客家人,却处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之外,在不同的殖民地政治社会环境之下,“客家”身份如何建构,便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英国殖民者来到香港新界及日本殖民者领有台湾的时代,也是近代人种观念建立的时代,殖民地者将自己对于殖民地人群的分类及其语言、风俗等的理解,利用制度与宣传工具固定下来,形成影响日后深远的“知识结构”。“客家”的身份,便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其用词也微妙地影响了后来者的理解。Hakka遂从一个中文的音译词,演变成了一个 race 的符号,并为西方世界所接受。这一观念影响了殖民地的人群划分,也影响了中文对于“客家”的理解和想象。正如安德森(Benedict R. Anderson)指出的,殖民者想象殖民地人的方式,以及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8]

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深刻体现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在清代,这些客家人在法律地位不平等的环境下,为了争夺科举名额与入住权利等,往往费尽心力;在殖民地之下,这一不平等便被消解了。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地位,伴随本地大族的衰落而明显上升;台湾六堆的客家人,则由于失去了清帝国下的“义民”光环,而显得风光不再。不过,在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客家人”一直是不被强调的;就地方社会而言,“客家”身份认同也未被作为政治符号加以运用。香港新界的客家人以“原居民”的身份,理直气壮地与政府讨价还价;台湾的客家人则以“广东人”的认同,积极参与到殖民地的建制中来,利用种种近代的政治经济机制谋求利益。

尽管殖民者早已确认了“客家”种族的存在,到 20 世纪中叶伴随中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一批客家知识分子有意创造出来的“客家意识”,影响才逐渐渗透到两地的地方社会。当 20 世纪近代客家自觉意识建构的年代,与华南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新界和台湾六堆,也不可能隔绝在真空当中,随不同时期及不同政治背景涌入的政治移民,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客家”身份建构都有很大影响,也影响到地方社会精英阶层建构自我认同的语言。就这一点而言,近代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的个人及学术经历,是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线索。这个时候的“客”,既脱离了定居时间和土地控制上的原始含义,也超越了省籍的观念,而成为血缘与文化上本质论的族群的滥觞。

现在“客家”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身份符号被广泛宣扬,固然与台湾本土学术潮流转变及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香港的学者与崇正总会“世界客家”的创造有关,这一身份建构与这两个地区实在的地方社会历史的关系,尤其是殖民经验的影响,亦应该重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

参考文献:

- [1]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
- [2]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11.” [D].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09-1912
- [3]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九,杂记,园亭,凤山县 [O]. 乾隆廿九年(1764): 643

- [4]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ün, and Their Neighbor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程美宝.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清末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72.
- [6]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1, 136-137.
- [7] Edward Burnett Tylor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M]. London: Macmillan, 1895.
- [8] *Downing Stree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899(9); 台湾总督府档案中译本(第 5 辑)[O]. 明治 28 年(1895)乙种永久保存,第 14-9 卷,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465.
- [9] 李志刚. *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之设立及其在广东与北婆罗洲之传播* [M]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二)*. 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1993. 汤咏诗. *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研究——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真会* [M]. 香港: 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 2002.
- [10] 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M].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54): 3-4.
- [11] E. J. Eitel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M]. Hong Kong: Saint, 1867: 49.
- [12]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M]. Hong Kong: Saint, 1867: 7.
- [13]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1.
- [14] 刘存宽. 骆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试析 [M] / 刘智鹏主编. *展拓界址: 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0: 4.
- [15] *Downing Stree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899(9).
- [16] Henrietta Harrison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M].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1.
- [17]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 *老台湾* [M]. 吴明远,译.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9: 34.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with an appendix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M].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66-67.
- [18] W. A. Pickering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Kingsley Bolton and Christopher Hutton eds., *Triad Society: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sociology and linguistics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9] George Leslie Mackay, edited by the Rev. J. A. Macdonald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M]. Chicago: F. H. Revell Company, 1895: 101-102.
- [20] 石井宮三郎編. *臺灣新地志* (據東京田沼書店明治 28 年

- (1895)版影印) [M].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12 小川琢治. 臺灣諸島志 (據明治 29年 (1896)東京地學協會版影印) [M].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167- 168; ルードウイヒツリ - ス. 臺灣島志 [M]. 富山房, 1898. 41- 42 竹越與三郎. 臺灣統治志 [M]. 東京: 博文館, 1905. 臺北: 南天書局, 1997: 188- 189.
- [21] 竹越與三郎. 台灣統治志 (據東京博文館 1905年版影印) [M]. 台北: 南天書局, 1997: 187- 189.
- [22] 持地六三郎. 台灣殖民政策 (據東京富山房 1912年版影印) [M]. 台北: 南天書局, 1998: 86- 87.
- [23] J. H. Stewart Lockhart Report on New Territory.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R]. 1900(9): Appendix No IV, V.
- [24] J. H. Stewart Lockhart Report on New Territory [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900(9).
- [25] J. H. Stewart Lockhart Report on New Territory [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900(9): Appendix No II.
- [26]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Z]. 1899- 11- 25 1900- 07- 14 1900- 11- 03
- [27]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Z]. 1904- 03- 11
- [28]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8- 40
- [29] H. H. J. Gampertz Appendix II. Report for 1900 New Territory [R].
- [30]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
- [31]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M].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43- 46.
- [32] 廖其銘. 彭翁樂三傳 [G] / 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 香港: 旺角文安印務公司承印, 1934: 12- 21
- [33] 彭樂三. 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志 [M]. 香港: 1934
- [34] 井出季和太原. 日據下之台政 (卷 1) [M]. 郭輝編譯. 台中: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7.
- [35] 陳秋坤. 清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 1700- 1900 [J]. 歷史人類學學刊, 2004 2(2): 1- 26
- [36]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 台灣土地調查規則施行細則 [O] /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第 1 回事業報告, 明治 35 年 (1902): 5
- [37] 許可開拓三種 [N].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06- 03- 09.
- [38] 井出季和太著. 日據下之台政 [M]. 郭輝, 編譯. 台北市: 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3.
- [39] 島政陳請四事 [N]. 台灣日日新報, 1900- 04- 08 (5); 園業主權下附 [N].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07- 05- 30 (3).
- [40] 若林正文. 總督政治と臺灣本土地主資産階級——公立台中中學校設立問題, 1912- 15 [J]. アジア研究, 1983(29): 7- 8.
- [41]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2
- [42] J. H. Stewart Lockhart Extracts From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M].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899.
- [43] William Julius Gascoigne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y [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899: 385- 388
- [44] J. H. Stewart Lockhart Report on New Territory [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1900: 259- 260.
- [45] 柴原龜二. 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份月報 [G] / 台灣總督府檔案案中譯本 (第 5 輯). 南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5
- [46] 許舒 (James Hayes). 祝賀鄉議局六十周年紀念 [J]. 1926- 1986 新界鄉議局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 香港, 1986: 115
- [47] 香港新界鄉議局同人. 樂三局長六秩榮壽大慶壽序 [J] / 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 香港: 旺角文安印務公司承印, 1934: 3.
- [48] 新界鄉議局的历史 [G] // 1926- 1986 新界鄉議局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 香港, 1986: 4; Kwan Lee-m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eung Yee Kuk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David Faure, James Hayes Alan Birch eds.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 [M].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164- 177.
- [49] 新界鄉議局歷屆局長- 主席 [N]. 新界中立報, 1978- 08- 31 (2).
- [50] 劉漢. 新界鄉議局 [N]. 新界中立報, 1983- 04- 15 (3).
- [51] 鄭萃群. 元朗新墟的創立及發展 [J]. 華南研究, 香港: 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 1994: 124- 142
- [52] J. Barrow.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ies for the Year 193: 12 [R]. Department of the District Office, Northern District.
- [53] 彭樂三編. 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志 [M]. 香港: 手抄本, 1934.
- [54]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59
- [55]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43- 46
- [56] 甘為霖. 素描福爾摩沙: 甘為霖台灣筆記 [M]. 林弘宣, 等譯. 台北: 前衛出版社, 2009: 304
- [57] 吳文星.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M]. 台北: 正中書局, 1992: 97- 99 許佩賢.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 [D]. 台北: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 [58] 鐘干郎口述, 鐘壬壽筆記. 鐘干郎回憶錄 [M]. 1968.
- [59] 祭祀公業ノ基本問題 [Z].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1936: 29- 32
- [60] 太原肥洲.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 [M].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99: 528; 臺灣紳士名鑑 [Z]. 臺北: 新高新報社, 1937: 294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Z]. 臺北: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1919: 365; 竹田鄉史志 [M]. 屏東市: 李明恭, 2001: 228 台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 [Z]. 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 1932: 527 鐘壬壽. 六堆客家鄉土志 [M]. 屏東內埔: 常青出版社, 1973: 233

- [61] 高雄州下官民职员录 [Z]. 高雄: 新高新报高雄支局, 1932-1940
- [62] 松崎仁三郎. 呜呼忠义亭 [Z]. 潮州郡内埔庄, 1935: 285.
- [63] Sow - 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程美宝.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M] / 杨念群主编.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64]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 [M]. 台北: 集文书局, 1975. 5; 程美宝. 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J]. 历史研究, 2003(4).
- [65] 蔡志祥. 汕头开埠与海外潮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以越南西贡堤岸市的义安会馆为例 [M] / 李志贤主编. 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 新加坡: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2003: 502-520. 关于潮、客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 可参见饶宗颐、黄挺、陈春声等人的文章.
- [66] 乙堂. 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 [Z] / 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香港, 1950: 2.
- [67] 赖际熙主编. 崇正同人系谱 (卷一) [Z] / 崇正同人系谱序. 香港: 香港崇正总会, 1995: 1.
- [68] 丘权政. 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7: 193-201.
- [69] 罗香林. 故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院长赖焕文先生传 [M] // 乙堂文存 (卷二). 香港: 中国学社, 1965: 92-95.
- [70] 伍于瀚编辑. 愚庐文缘前集 (上卷) [M]. 台山: 1926: 10-11.
- [71] 罗香林, 主编. 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M]. 香港: 香港崇正总会, 1950: 29-51.
- [72] 萧耀章. 纪念罗香林教授——记 < 客家研究导论 > 日译本再版经过 [DB/OL] <http://www.graceph.com/phpBB2/viewtopic.php?t=312> 2006-09-01.
- [73] 叶伦会, 编著. 真情实话: 温送珍访谈录 [M]. 台北市: 兰台出版社, 2007.
- [74] 刘正一. 六堆内埔天后宫沿革志 [Z]. 六堆内埔天后宫、昌黎祠管委会刊印, 2002: 39.
- [75] 邱春美. 六堆客家古典文学研究 [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2007: 265.
- [76] 罗敬之. 罗香林先生年谱 [M]. 国立编译馆, 1995: 68-69.
- [77] 黄石华. 香港客家人士之贡献与成就 [Z] / 香港崇正总会金禧纪念特刊. 香港: 1971: 64-71.
- [78] Benedict R.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责任编辑: 李自茂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Luidui in 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s

CHEN Lihua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lucid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kka” identit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Luidui of southern Taiwan under different colonial regime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y became colonies ruled by Britain and Japan respe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was first shaped by the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land policies impos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and then strengthened by the changes in loc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immigrants in modern perio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olonies would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modern period.

Key words New Territories; Luidui; colony; Hakka;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